



曲 枫 主编

〔德〕迈克尔·克努佩尔 副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Arctic Studi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曲 枫 主编
〔德〕迈克尔·克努佩尔 副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 一 辑

Arctic Studi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环境史与考古学

- 18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欧洲方式与丹麦本土方式的冲突与交融
..... [爱尔兰] 保尔·霍尔姆 / 3
- 亚马尔北极和亚北极地区考古研究..... [俄] H. B. 费奥多洛娃 / 34

西伯利亚研究

- 默克收集的雅库特资料及其历史词典学意义
.....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 47
- 博戈拉兹的楚克奇人调查研究..... 张 松 / 52
- 乌尔奇人的熊崇拜和熊节
..... [苏]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佐洛塔廖夫 / 74

中国近北极研究

- 中国通古斯诸族和韩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境遇比较研究..... 苏 杭 / 89
- 历史上鄂伦春族与外界经济、社会交往中的政治关系色彩..... 何 群 / 105
- 中国近北极民族北方通古斯人及其文化变迁..... 唐 戈 / 122
- 边缘社区与多面认同：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族群体文化认同研究
..... 马惠娟 / 128
- 改革开放 40 年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的积累与利用..... 金 洁 / 141

旅游与地区发展学

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潘 敏 李浩涵 / 153

Experiencing the Arctic: European and Chinese tourists in Greenland
..... Daniela Tommasini, Zhou Shenghan / 170

人口较少民族如何发展

——以鄂伦春自治旗为例 刘晓春 / 186

学术动态

美国斯密森学会北冰洋研究中心走过的风雨 30 年: 1988 ~ 2018 年
..... [美] 威廉·费茨休 / 197

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 (ASC) / 202

征稿启事 / 204

Call for Submissions / 20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通古斯诸族和韩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境遇比较研究*

苏 杭

摘要：本文以同属典型萨满教所在区域，即东北亚的中国通古斯各民族和韩民族萨满教为研究对象，对两者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所被赋予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比较，发现萨满教的包容性是帮助外来文化与韩民族自身融合在一起的重要原因，这也成为其不同于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的显著特点。

关键词：萨满教 通古斯 韩民族 民族认同 宗教互动

作者简介：苏杭，韩国又松大学专任教授。

萨满教的信仰基础是万物有灵论，相信所有事物都有其灵魂，关注的是神灵世界的存在以及人与神灵的一种关系，是“一种以萨满为中心，进行超世间交流，并且形象癫狂的宗教现象”^①。无论是从世界范围的横向的视角还是人类历史的纵向视角来看，萨满教这种宗教文化现象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普遍性，它是一种世界性宗教文化现象，也是一门世界性学问。从16世纪一些神父、冒险家以及政治流放者开始对萨满教关注以来，萨满教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也告诉我们，萨满教是国际社会范围古老且影响广泛的文化模式。放眼世界，不仅东北亚、中亚存在，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北亚文化圈农耕文明视阈下的中韩萨满教比较研究”（18BZJ052）阶段性成果。

① 译自《新大英百科全书》，1974，第638页。

而且北欧、北美、南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地都存在过这种古老文化遗存，甚至至今在一些地区它仍以各种鲜活的形式展现着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很多地方出现了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平台保护萨满文化的现象。

从学术上看，萨满教定义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指东起西白令海峡，西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并包括北美、澳大利亚在内的所有原始巫术形式；狭义萨满教指的是以西伯利亚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各民族的民间信仰形态。本文从狭义萨满教角度出发，以中国通古斯各民族和韩民族萨满教为研究对象加以考察。作为典型萨满教所在区域即东北亚的萨满教，各民族萨满文化形态之间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既存在区别又存在相似或相同之处，对这一地区民族的萨满教进行比较研究，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 研究背景

关于通古斯诸族或韩民族萨满教早期的研究，中国国内起步最早的当属凌纯声先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完成的民族志著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书中详细记述了赫哲族萨满教观念，萨满教的派系、类型、传承和职能，萨满祭祀仪式、占卜等赫哲族萨满教文化习俗以及民间文艺等内容，曾被誉为“中国民族学的第一次科学田野调查”^①，这部著作同时也开了中国学界对于萨满教研究的先河，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当时条件下，相比于当时国外一些学者对东北亚地区萨满教的关注，国内对萨满教的研究还不成系统。这一时期，日本人类学家的研究走在了前列。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满、鲜的竿木崇拜》（1936）、日本学者秋叶隆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上进行过广泛的调查和记录，他和赤松智城合著《满蒙的民族与宗教》（1941）收录了《满洲萨满教的家祭》《满洲萨满考察记录》等调查报告，秋叶隆专著《朝鲜巫俗的实地研究》（1950），客观地记录下了有关当时萨满教的第一手资料，是之后研究东北亚萨满教的必读著作。

对于东北亚地区通古斯诸族和韩民族萨满教的比较研究，国内研究屈指可数，相关研究中较突出的成果有色音《东北亚的萨满教：韩中日俄蒙萨满教比较研究》（1998）、孟慧英《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2000）、郭淑云《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2007），三部著作中都以民族为脉络对

^① 郭淑云：《中国萨满教 80 年研究历程》，《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 9 辑，第 84 页。

萨满教进行阐述,对通古斯和韩民族的萨满教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尤其是孟慧英的《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是第一部对萨满教进行宗教学的专著。该书利用中国著名宗教学者吕大吉先生的“宗教四要素学说”,针对中国狭义上萨满教进行的结构性研究十分具有系统性,具有里程碑意义。新近研究有苑杰《传统萨满教的复兴:对西伯利亚、东北亚和北美地区萨满教的考察》(2014),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萨满教现状与复兴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的很多问题颇有新意,该书中部分章节谈到了东北亚萨满教,但未涉及中韩萨满教比较研究。关于朝鲜半岛巫俗的研究,国内还有乌丙安《朝鲜巫俗与满蒙巫俗的比较研究》,该文以民俗学视角,对朝鲜半岛萨满教与满蒙萨满教对比问题有所涉及。^①韩国学者尹以钦是在中国国内介绍韩国宗教较为知名的学者之一,他的《韩国历史上的萨满教角色》一文中,认为萨满教在韩国宗教史上,具有作为表达大众需求途径和作为多种官方文化模式之相互关系一种疏导的双重角色。^②林成姬的博士论文《韩国巫俗文化研究》(2011),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了韩国巫俗文化得以保存完整的原因。代娜新的《朝鲜半岛萨满教的历史发展梳理》(2013),不但对萨满教在朝鲜半岛的产生、发展及衰落的过程进行了历史性的梳理,而且论证了儒释道对朝鲜半岛萨满教发展过程的影响,确定了萨满教在朝鲜半岛历史上以及官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从历史纵向上研究韩半岛萨满教是有借鉴意义的。^③

在韩国学术界,巫是韩国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所以对于巫的研究必然是韩国学术重心之一,较之于中国也更成体系。现存的史料中,关于巫的最早著作有朝鲜高丽时期李奎报(1169~1241)的《老巫篇》,尽管此书主要是将巫教视为淫歌乱语的批判,但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高丽史》以及《朝鲜王朝实录》之中,也都散见巫教的一些记载。随着20世纪初以来现代学科方法的建立,朝鲜半岛在萨满教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代表性的学者。李能和的《朝鲜巫俗考》(1927)是为研究韩国历史和古代宗教、生活风俗而编写的著作,该书阐述了巫的起源、巫的发展轨迹、巫的功

① 乌丙安:《朝鲜巫俗与满蒙巫俗的比较研究》,《民俗研究》1996年第3期,第56~62页。

② [韩]尹以钦、张跷校:《韩国历史上的萨满教》,《满语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1~137页。

③ 代娜新:《朝鲜半岛萨满教的历史发展梳理》,《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第21~24页。

能、巫的宗教意义、巫歌用语、地方神堂、神灵等，系统而全面。崔南善《萨满教劄记》（1927）也聚焦于韩国古代信仰，兼及西伯利亚萨满教和日本周边民族的原始宗教。另外，还有一些神歌研究硕果累累，其中一些集中在韩国学者对本民族萨满教早期文献研究方面，如孙晋泰在20世纪30年代著述的《朝鲜支那民族之原始信仰研究》和编纂的《朝鲜神歌遗篇》比较突出。当代韩国萨满教研究的集大成者当属民俗学家金泰坤先生，在巫歌研究方面他有一系列的著作，包括《黄泉巫歌研究》（1966）、《韩国巫歌集（1—4）》（1971~1979）、《韩国的巫俗神话》（1971）、《韩国巫俗图录》（1982）等。韩国本国从民俗学路径对萨满教进行研究，涌现了一批有名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如宋锡夏《韩国民俗考》（1960）、柳东植《韩国巫俗的历史与构造》（1975）、金泰坤《韩国巫俗研究》（1980）、崔吉城《韩国的巫俗研究》（1980）、赵兴胤的《巫与民族文化》（1990）、李成市《古代东亚细亚的民族与国家》（1998）等，这些著作利用文字都对朝鲜半岛萨满教的历史形态有着不同程度的再现，也都能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民族传统文化的视角下，研究韩国萨满教的现代生命力及核心价值。在对整个东北亚萨满教研究方面，全北大学人文学研究所著的《东北亚萨满教文化》（2000），收集了东北亚各国学者的萨满教研究论文，包括对韩国和满族巫俗神话的比较、中国和日本的萨满教比较、满族的祭礼、满族的柳崇拜等。但较之于韩国本国萨满教的研究，对中韩萨满教的比较研究，韩国学术界也并不充分。

中韩以外的国际研究方面，较突出的英文研究成果有：萨拉·米利奇·纳尔逊所著《萨满教与国家起源——东亚的精神、权力和性别》（*Shamanism and the Origin of States: Spirit, Power, and Gender in East Asia*）（2008），作者利用大量历史文献、神话以及考古资料，对东北亚中日韩三国萨满教现象进行人类学的比较研究，认为在主要由女性担任萨满的复杂社会中，萨满成为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在受众的精神世界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克拉克·奇尔森主编的《亚洲的萨满祭司》（*Shamans in Asia*）（2003）^①收录了关于亚洲萨满教研究的六篇文章，其中关于东北亚萨满教的研究主要有格奥尔·海固的《中国驯鹿人萨满教的社会意义》（“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Shaman among the Chinese Reindeer-Evenki”）、John A. Grim的《财数固特：韩国萨

^① *Shamans in Asia*, Edited by Clark Chilson, Peter KnechtRoutledgeCurzon, 2003.

满的表演》(“Chaesu Kut-A Korean Shamanistic Performance”)、武内直子的《宫古神学:萨满对传统信仰的诠释》(“Miyako Theology-Shamans'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Beliefs”)和《从萨满日记看宫古萨满的潜在体验》(“Liminal Experiences of Miyako Shamans Reading a Shaman's Diary”)等,但都未涉及中韩萨满教对比研究。韩国西江大学名誉教授丹尼尔·基斯特的《韩国和东北亚地区的萨满世界》(*Shamanic Worlds of Korea and Northeast Asia*) (2010)一书,是目前西方学者中对中韩萨满教比较研究做得较突出的成果。Kister从1994年至2010年写作并出版过许多关于萨满教研究的论著,如《韩国萨满祭祀仪式:符号与戏剧改造》(*Korean Shamanist Ritual: Symbols and Dramas of Transformation*) (1997)、《萨满教的儿童出生神话》(*A Korean Shamanist Myth of Child Birth*)等,也曾作为专家参加过“河南·中国神话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对萨满教有着专业独到的研究。在他的《韩国和东北亚地区的萨满世界》一书中,主要偏重于对中韩萨满仪式进行讨论,还涉及固特经验与基督教经验、韩国和西伯利亚的神圣生态、固特仪式与前卫的剧院等方面的研究,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当今萨满教研究在国内和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截至本研究开始的2018年,在中国主要学术搜索平台——“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中国知网”,主题栏检索“萨满”的结果分别是3700和5200多篇学术论文。可见对于萨满这一古老文化现象,中国学界的研究态势是热络的。总体而言,中外学术界对萨满教的研究基本还在民族宗教框架下进行,偏重于民俗、文学的研究,而对通古斯和韩民族之间萨满教的比较研究是罕见的。因此,本课题希望通过通古斯和韩民族萨满教进行深层次的交叉学科研究和特征性把握,拓宽我们国际萨满教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

二 通古斯诸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境遇

通古斯一词的出现源于17世纪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扩张过程中和鄂温克人的遭遇,他们将分布在贝加尔湖以东至鄂霍茨克海,北抵北冰洋,南至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内以渔猎采集为生的这些族群,泛称通古斯人。在这个称谓上,他们沿用了雅库特人“通乌斯”的叫法,因误读而成为“通古斯”,之后这一称呼也随之传播到欧洲。直到20世纪,这一称呼被语言学家引入到语言学领域之前,这一词语专指鄂温克人。作为语族概念的“通

古斯”出现后，特指那些在语言结构和形态变化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的若干民族，在中国这些民族分别是满族、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民族；在更靠北的西伯利亚等地还有埃文基、那乃、乌德盖、乌尔奇、奥罗克等民族，他们都被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这个语言学的概念所覆盖。这些民族不仅在语言学意义上具有一致性，在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方面也具有亲密的同质性。尽管通古斯诸族在历史发展上存在不平衡现象，尤其该族群中的满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使得他们的萨满教具有独特性，但从大体相同居住区域内经济生活方式相近的这些通古斯诸族整体来看，萨满教在信奉和行为上是具有相通性的，这在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诸学科的认识中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萨满教作为人类原始社会主要信仰形式，分布极为广泛，从今天的研究来看，亚洲东部、美洲与北极地区都是萨满教流传地区。萨满教究竟源自哪里，学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尽管中国有着大量历史资料可供检索，也有着关于萨满的最早记载，且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萨满教源自中国黄河流域的说法，但其实并无定论。从萨满教今天的发展情况来看，萨满教更像一种世界性共生的宗教文化形态，更有学者认为整个世界古代文明就是一种萨满式文明，“认为人类最初的文明就是萨满文明，萨满教是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原始宗教”^①。

苏联学者斯莫良克曾指出“萨满”的“sa”在通古斯语中是“通晓”“知道”之义，因而“萨满”指的是“通晓神意之人”。^②“萨满”一词，迄今世界上最早的记载见于我国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中关于“珊蛮”的记述。全书会编了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代帝王时期关于宋金和战等多方面史料，是学界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书载：“兀室（完颜希尹）奸滑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国，国人号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之能友。”^③完颜希尹是金国宰相，也是女真文字创始人，粘罕指金国大将完颜宗翰，他们两人曾在靖康年间随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俘虏北宋徽钦二帝。从这段文字来分析，“珊蛮”不仅有着重要的宗教职能，还是世俗领袖，由此可以推断出这个时期通古斯人萨满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有学者还指出，“萨满”一词

① 色音：《中国萨满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5月，第327页。

② A. B. 斯莫良克：《萨满：萨满其人、功能、宇宙观》，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6页。

③ 秋浦：《萨满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页。

还与佛教沙门以及秦始皇求“仙人羡门之属”有关^①，两者的名称极有可能是古印度在雅利安人进入之前，受到了来自古代蒙古鞑靼人和突厥人信仰萨满教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萨满教远在佛教产生之前，在中国北方民族中就已经广泛流行并产生过重要影响。关于萨满的史料记载更为丰富的当属清代，乾隆十二年（1747）刊行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就出现了满文“saman”一词。而关于“萨满”用汉语记音时的写法也一直较为复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最先使用“萨满”写法的，是《大清会典事例》，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②

通古斯人在悠久的历史中，建立起相似的经济和区域生活方式，拥有以及相通的萨满教信仰。通古斯各民族一直繁衍生息在东北亚的黑龙江流域，长期以来交错杂居或小村落聚居，也有一些民族或氏族南迁，走出了黑龙江流域。作为一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生活的产物，这个地区通古斯诸族的萨满教被学术界公认是萨满教代表，而且通古斯诸族萨满教也各具自身民族的风格。

满族因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萨满教经过制度化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神谕、神器和礼仪，给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实物。然而，满族经济生产方式和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也使得满族萨满教在通古斯诸民族萨满教中成为独特类型。

作为狩猎民族的鄂伦春人，大小兴安岭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还赋予他们的萨满教更加具有浓郁的森林狩猎文化特点，在人与自然、动物的关系上表现得更为积极。“鄂伦春”含义有两种，一是住在山岭上的人，二是使用驯鹿的人，从其族名就可以判断得知他们的萨满教跟山林和驯鹿关系密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鄂伦春人逐渐走出大山，由游猎变为定居，传统萨满文化也随之迅速衰落。近来关于鄂伦春萨满教的学术研究，也大多仅限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

鄂温克族分为三个部分，既有在松嫩平原从事农耕的索伦鄂温克；也有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从事畜牧业的通古斯鄂温克；还有一部分聚居在大兴安岭根河市从事游猎、饲养驯鹿的雅库特鄂温克。他们的生活也采取着定居、半

① 方汉文：《萨满、羡门与沙门：佛教人华时间新释》，《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第125～133页。

② 赵志忠：《“萨满”词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139页。

定居和非定居的形式。随着俄国人对边境的侵扰和清廷征调，鄂温克人逐渐形成三部，鄂温克萨满教也由此表现出丰富的内容。在长期和布里亚特人以及沙俄人争战的历史中，鄂温克萨满教与外来的佛教、东正教相互排斥、融合，原本俄国境内的一些萨满进入中国境内，并在当地产生影响。此外，外来宗教的进入不仅使一些鄂温克人改宗喇嘛教或东正教，鄂温克萨满教中也融入了佛教和东正教的元素。萨满教曾经影响着鄂温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居住区域呈现不同的表现并和其他建制宗教有着不同程度的互动，是鄂温克萨满教的一大特点。但随着各个氏族老萨满的离世，其现状面临着衰落。

赫哲族是自古沿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而居的渔猎民族，渔猎文化在他们的萨满教中则表现得更为突出。赫哲族萨满教有着完善的发展形态，和其他通古斯诸族萨满教有着极大共同性，但因其经济方式多为渔猎，因此对鱼神的崇拜使赫哲族萨满教又具有自身鲜明特征。此外，赫哲族萨满教所用神偶在派别、等级和分工等方面都非常精细，这也是在通古斯诸族中比较有特色的。和其他通古斯诸族一样，赫哲族也是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尽管保留了大量口头文学和文化遗存，萨满教和赫哲语一样，都处在濒临消失的状态之中。

通古斯诸族萨满教，在整体上作为世界萨满教的典型，代表着人类最早的宗教思想文化和精神内涵。尽管随着社会经济模式变化以及在和现代文明互动的进程中，通古斯诸族萨满教无一不失去了原有信仰空间而呈现着衰亡态势，我们的研究也越来越只能凭借着历史的记忆和对濒危文化的保护活动得以进行，但对先民们萨满教在历史各种时期经历的追溯，正是我们人类迈向自我了解的第一步。

三 韩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境遇

韩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基督教、萨满教、佛教、儒教以及一些新宗教和平共处在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之中，而诸宗教中没有所谓的官方宗教，也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现代之前，朝鲜半岛的官方意识形态发生过很多变化。5世纪之前，中国的传统宗教即儒教、佛教和道教还没有在此流行之前，萨满教是韩国人主要的宗教形态。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从此佛教成为官方宗教。14世纪，李氏朝鲜肇兴，儒教成为正统。基督教新教在近代

以来的这 100 多年间开始生根发展，迅速增长。

面对众多的宗教意识形态，有学者将韩国各宗教间的关系比喻成三层同心圆模式^①，即影响了韩国人最基本思维方式的萨满教居于核心层，影响了韩国人伦理道德和人生观的儒教、佛教居于第二层，而还未渗透韩国人伦关系之中的基督教位于最外层。作为韩国的本土宗教，萨满教从远古到今天一直为人们提供行为准则。其通过两种原理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一方面是通过对于邪恶神灵的诅咒和控制来避免灾祸的发生，另一方面通过对一些良善神灵的世俗性祝福、祈祷和献祭来获取平安和幸福。

萨满教是韩国最古老的宗教，也是最为普遍的信仰形式，在韩国称为神教或者巫教。自从韩民族开端起，萨满教即已经存在。尽管无人知晓其创立者，也没有经典可寻，但萨满教的影响却是深远而广泛的。在这种意义上，萨满教并不像那些有着高级宗教教理的宗教。有韩国学者就曾给予萨满教最高的评价，称其为韩国文化之根。^② 还有人认为巫教自始至终贯穿韩国历史，至今还存在于人们生活周边，不仅是韩国民族艺术文化的创造主体，还对其国民性格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然而尽管确实很多人沉湎在萨满文化氛围之中，却很少韩国人声称自己是萨满教信徒。这是因为萨满教在韩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曾一度被视为低级的迷信，大部分韩国人不愿意承认他们的信仰是需要靠着世俗性的祈求获得神灵对他们的应许。萨满教在韩国的影响是隐性而非显性的。

研究韩国萨满教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檀君神话。严格地说，韩国的檀君神话并非信史，因其无可稽考。但在这个神话中可以发现一些在古代韩民族中对天神的崇拜迹象和文化内涵。韩民族将檀君既视为天神的后裔和韩民族的祖先，也看作韩民族历史上第一个萨满。除了始祖檀君，韩国的萨满教中还有很多神、精灵和魔鬼，也包括对山、河、日、月、星、辰等自然物的崇拜。在古代韩国，人们信仰的神灵众多。这些神灵都居住在物质世界之中，诸如石头、树木、河流、江海、土地和天空中。韩国萨满教信徒信仰神灵众多，金泰坤先生将这些神灵分为四个类型，即社区神龛上的仪式神、一般的家庭神灵、村庄宗教仪式上的神灵和每个家屋里的神灵。也有按照自然神、

^① 朴钟锦：《韩国宗教多元化的特点分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 年第 6 期。

^② [韩] 崔俊植：《从韩国宗教的现实及其透视镜观察到的韩国文化》，《当代韩国》2006 年秋季号。

人神来进行分类。为了控制这些神灵，人们需要进行跳神、祷告和献祭等一系列宗教仪式。祈求神灵能给予他们内心的平静、健康、财富、长寿，避免诅咒和惩罚。在给这些神灵们献祭之后，韩国人通常会在一起吃喝，庆祝他们从神灵中获得了神力。人的出生和死亡是人最重要的两个时刻，韩国萨满教信徒认为，当一个人死后，尽管其肉体消逝，不朽的灵魂却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仍然可以在人世间飘荡至少三年。一个祖先的灵魂会在特殊的时候回来照顾他的子孙们，据说可以看顾四代人。^①

韩国萨满大多属于善良神灵引导下的白巫，他们在宗教实践中多是对付和控制恶灵，驱除他们离开人们，让人们远离魔鬼。韩国萨满教中称女性萨满为“巫堂”，男性萨满称为“博数”（由“博士”一词演化）。在韩国萨满教中，巫堂的地位往往高于博数，博数人数很少而且他们的作用往往也是被边缘化的。在萨满教的驱魔仪式“固特”中，巫堂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是仪式上的领导者，博数仅仅是她的助手。但在韩国传统社会中，无论男女，萨满这一职业都被看作社会的最底层。这与很多世纪以来韩国的统治者都将萨满教视为迷信的、消极的活动有关，但近年来对萨满教的看法有了变化，人们更普遍地将萨满教作为一种和韩国民族传统之根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象征加以看待，同时萨满教也成为韩民族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些相关研究直指其可能已经在朝鲜半岛存在了几千年，目的就是为韩民族的追根溯源和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凝聚力提供历史依据。

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朝鲜时代，儒教理学被尊崇为朝鲜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和礼仪标准。首先接受儒学思想的是两班贵族阶层。对于他们来说，坚持以儒学思想作为文明行为的标准是维护他们社会地位的先决条件。为维护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政府将地方宗教崇拜的各种形式都控制于其统治之下。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萨满巫师们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儒学所倡导的文明概念和萨满教礼拜形式是完全不相容的。于是，各种萨满就失去了曾经（官方的求雨祈福等礼仪形式）的地位，变成了受压制对象。

当近代朝鲜被迫对外国列强打开大门的时候，萨满教的境遇依旧没有什么变化。作为中心意识形态的儒教迅速失去了影响，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和西方传教士们所带来的新思想迅速盛行，尽管他们对萨满教的批判不如以前儒教学者们严厉，但依旧将萨满教视为低俗、愚昧的迷信。近代初期的基督教

^① 孟慧英：《韩国萨满教印象》，《当代韩国》2005年春季号。

教会以及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者们致力于向公众传播现代化理念和独立民主思想，因而对萨满教的抨击更是超过当权的统治阶层。他们鼓动民众加入反对迷信的斗争之中，甚至怂恿警察对萨满巫师进行迫害。^①

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萨满教的处境开始有一些微小的变化。那些曾经严厉批判萨满教的半岛的报纸和组织放缓攻击，而新的日本殖民统治者并不把萨满教视为民间教派，只是将其视为其统治治理的一种障碍，他们更加倾向于培植佛教势力以作为日韩合并的思想文化要素。就在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压迫日趋沉重的时候，一些朝鲜半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韩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并逐渐以一种积极态度看待他们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萨满教开始显现不同的光芒。这种趋势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当时朝鲜刚刚对外开埠，而外国势力的到来开始让朝鲜人有了一种本能的本土主义的回应，这在东学运动中可见一斑。朝鲜人开始将萨满教和朝鲜的起源神话即檀君朝鲜联系起来，做出了新的民族主义式的解读。

20世纪20年代开始很多出版物开始对萨满教产生了新的兴趣。著名文学家崔南善^②在其文章中就提出了檀君既是古朝鲜的立国之君又是一个萨满的观点。檀君的形象被抬高到一个民族—国家象征的高度，这个时代的学者们对萨满教的看法已经大不同于从前。崔南善通过对萨满教和民俗故事的研究，试图强化韩国人的自我意识。日本殖民政府总督为了寻求日本文化和朝鲜文化之间的相似性，指定崔南善对朝鲜的传统风俗和信仰进行研究。但崔南善的研究却另有目的，他试图证明韩国人的历史和日本没有太多密切关系，而不是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那样。他指出，韩民族萨满教更多的是和东北亚以及西伯利亚萨满教有关，而跟日本全无关系。因此，在被日本占领的黑暗年代，部分学者对萨满教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1945年朝鲜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但局势的改变并没改变萨满教的境况。社会对它们的排斥仍然强烈，警察也经常干扰它们的仪式活动。萨满活动被很多人认为是可耻的，进行跳神仪式的人家也都对外讳莫如深。1971年韩国政府发起新村运动，为的是加速农村发展，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这项运动意在实现韩民族自我发展现代化，提倡理性、科学和市场经济。此时，不仅萨满教仪式也包括儒教

^① Kendall, Laurel. *The Life and Hard Times of a Korean Sham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P. 343.

^② 崔南善（1890~1957），朝鲜著名文学家、诗人，是朝鲜近现代文学的开拓者。

传统中很多旧习俗，都被认为与现代化是相悖的、非理性的。但随着运动的发展，朴正熙总统在新村运动中逐渐意识到需要通过韩民族文化遗产来加强韩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自信，有必要为了强调韩国自身的精神文化进行相关研究。而除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以外，更多的学者也开始自发关注这些问题。

如今，韩国无论政府、学界还是社会普通民众，对萨满教的评价相对而言还是很积极的。虽然对萨满教否定的观点依旧存在，但是随着跟外面世界的接触，萨满教促使韩国人产生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反应，一种在纷繁世界中寻找自身认同的尝试。今天的韩国人普遍认为韩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即民族之根可以在萨满教中找到这一说法，他们相信萨满教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而萨满也被看作古朝鲜文化的保存者。在韩国政府以及民族主义学者、知识分子们对萨满教形式进行重构的过程中，萨满教不再被视为迷信，而更多地成为一种增加民族的自信心的抽象概念，以满足韩民族对民族—国家认同的需要，增强其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汉城大学的赵兴胤教授指出，“在韩国文化边缘，这些萨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在主流文化中寻找他们的踪迹却不是易事。这就是韩国萨满教今天存在的基本状况”^①。

四 通—韩萨满教与其他宗教的历史互动

萨满教是生命力极强的一种宗教，任何外来宗教传入萨满教流行地区后多少都会吸收萨满教的元素，所以，萨满教在一个地区的历史发展中，也越来越表现出复合性特点。而萨满教对外来宗教的影响，在中国萨满教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萨满教或苯教对藏传佛教的影响，使藏传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具备了萨满所使用的狂醉、神灵附体和治病的所有能力。这种现象，色音在《中国萨满文化研究》中称之为“侵入性复合”。他认为萨满教与其他宗教互动的过程可以有两种复合形式：“从总体而言，萨满教和其他宗教的复合大体可分为吸取性复合和侵入性复合两大类型。吸取性复合是指萨满教的内在基本结构和特征没有大的影响，只是对一些神名、用语等外在形式发生了微小的影响。侵入性复合是指萨满教的要素侵入外来

^① Kendall, Laurel. *The Life and Hard Times of a Korean Sham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P. 343.

宗教中，部分的渗透或内化于外来宗教的整体结构中。从萨满教的角度来看前者是内向型复合，后者是外向型复合。萨满教同外来宗教的复合是不同宗教相互让步、相互妥协的必然产物。”^① 韩国萨满教相比通古斯萨满教，更接近于侵入性的复合形态。这在韩国佛教的七星崇拜以及儒巫杂糅的洞祭、家宅祭祀、城隍祭等仪式中都可以看到，甚至基督教这种近代以来才得以在韩国发展而且颇具排他性的宗教形式中，也渗进了很多萨满教元素，使韩国基督教别具一格。

韩国基督教融入了韩国主要的宗教观，特别是位于韩国人宗教文化核心的萨满教，得以确保这一外来宗教更好地生长于韩国土壤之中。萨满教是韩国宗教文化核心，是内化于韩国人精神深处的基本信仰观念，对韩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有重要影响，为便于增进韩国民众的接受度，韩国基督教通过萨满教化的本色化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

在韩国萨满教的诸多神灵中，最高位的神是天神하나님 (hananim)，这个名词是土生土长的韩国神祇的称呼。佛教在进入韩国和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萨满教하나님这个名称并来指代宇宙中最高统治者。在基督教进入韩国的过程中也将这个名称借用，并用于指称圣经中以色列人的神。在韩国基督徒的意识中，하나님은唯一真神，因为其不仅和其所创造的宇宙完全分离，而且完全独立于其所有神灵魔鬼系统之外。对하나님의崇拜大概是在高丽王朝时期(10~14世纪)开始，这个词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朝鲜王朝时期。하나本义指天空，하나님这个词由하나和님组成，님은对人尊称的黏着语，可以意为尊敬的、主等，하나님意味着“天上的主”，显然是自然崇拜的产物。在今天的韩国，하나님几乎已经成为基督教的专有词语，很少有人会首先想到其真正来源是韩国的萨满教。在萨满教的自然神灵中，天神居于中心位置，这在其他教文化中也可以见到。

基督教传入韩国后，韩国基督徒将对하나님의神性和《圣经·旧约》里耶和华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为了在新的环境里能够对以色列的神进行崇拜和祷告，하나님这个既没有神学教义也没有经典文本的神的名称填补了韩国人对基督教 GOD 翻译的空白。于是，传教士和韩国基督徒们赋予了하나님全新的含义。因此，可以说，在萨满教的하나님这一名称的帮助下，韩国人更容易接受基督教。因此，하나님超越了萨满教的意义，受洗而重生了。

^① 色音：《中国萨满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第295页。

韩国基督教世俗化倾向严重，也源自于基督教对萨满教实用主义特点的吸收。萨满教的神灵概念包括祖先、自然物、韩国历史上的帝王、将领等，他们有能力转变个体的命运，而且这些神灵必须通过萨满仪式对他们祝祷才得以显灵。于是萨满教信徒们通过固特仪式来祈求神灵显灵，通常用精美的食物、表演萨满舞蹈和音乐作为奉神的形式，来实现他们的物质性祈福，比如长寿、健康、生育男婴和得到财富等。这种民间宗教最显著的特点是其仪式中的入神状态和仪式后强调物质祈求的实现，极具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特点。在本色化的过程中，韩国基督教逐渐采用了萨满教强调的祝祷或与神交通而达到物质愿望的实现这一要素，将基督教本色化表现得更为贴切。今天无论我们走进韩国哪一派教会，对教会的礼拜奉献进行观察，大多会看到很多基督徒将奉献的目的和世俗的祝福联系在一起的奉献形式，即“所望奉献”。这种将金钱和所书写的愿望清单放在一个信封中的奉献方式是新教教会中最常见的形式。另外还有一种“感谢奉献”也很有特点，对于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内的很多韩国基督徒来说，他们贡献金钱给他们的教会，都是在试着对神表达他们的感谢并确保神能给他们不断的祝福，有着极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和世俗化倾向。

在基督教随着近代殖民主义扩张而传播的过程中，通古斯萨满教受其影响并不大，更大的冲击来自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中国通古斯诸族世代生活在黑龙江流域广阔的地域里，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其主要的经济活动围绕狩猎、捕鱼、采集并非农耕而展开。之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通古斯人那里寻找到较为典型的萨满教现象，首要原因是渔猎经济下的原初形态并未发生改变。但是，能始终留守在大兴安岭深山中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些族群的流动和迁徙，必然带来经济运作模式的变化，所以，通古斯诸族萨满教整体上呈现衰退状态。当然，外来宗教的影响也在发生着作用，比如，使鹿鄂温克族在婚俗仪式上耶稣像的使用，牧区鄂温克人在丧葬风俗中对70岁以上老人的死亡称为“成佛”，等等。而韩国的情况是，原始的萨满文化不但经受着宗教的排斥，也受到历史各时期当政者的打压，近代以来更是受到急速发展的现代化的冲击。在不断被边缘化、转入地下生存的过程中，韩国萨满教不仅融合了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元素，甚至还出现萨满教渗进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现象，从而使得这些建制宗教形态被贴上了本土化、土著化的标签，因此，在对待外部文化时，韩国萨满教和其他建制宗教产生的互动是非常积极的。

结 语

宗教活动可以增强一个族群集体的自我认知,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接受集体的情感而强化其社会秩序,并且在图腾崇拜的过程中,增强他们对自我社会统一体的意识。宗教为社会集体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集合提供着一种约束和控制人们信仰和行为的内在模式。涂尔干说过,“社会以宗教崇拜的方式,崇拜它伪装起来的自身形象。在民族主义时代,社会公然进行自身崇拜,把伪装抛在了一边”。^①那么,宗教崇拜是社会自我认同的方式,而在宗教思想衰落的时代,民族成了社会自我认同的最佳方式。在20世纪,几乎所有民族国家都普及了义务教育,把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加以普及。韩国也是如此。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普遍存在的虚假意识的影响。它的神话颠倒了事实:它声称捍卫民间文化,而事实上,却在构架一种高层次文化;它声称保护着一个古老的民间社会,而事实上,却在为建立一个没有个性特征的大众社会推波助澜。”^②所以,一个没有个性的大众社会,民族就是其唯一个性,这也是民族主义发明民族的具体操作。所以在盖尔纳那里,民族具有辩证性,一方面是同质的,一方面又与其他社会相区别。在这个辩证的过程中,民族国家一直在致力于强调实现文化疆界和政治疆界亦即地理疆界的重合。

在中国长城之外和朝鲜半岛广袤土地上的萨满教,因为东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不同族群的萨满教表现出不同特点,不同的历史境遇也赋予不同族群萨满教各具特色的范式。通过本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韩国萨满教区别于通古斯萨满教,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即:在其历史的境遇中,萨满教的包容性帮助外来文化与韩民族自身融合在一起。对待儒教如此,对佛教如此,对基督教更是如此。通过萨满教对诸外来文化的改造,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诸外来宗教在韩国土地上具备了能被广泛接受的基础,在不同时代促进着韩民族社会的自我认知,更在近代以来能与民族主义潮流相融合,从宗教层面加强了韩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感。这样的功能在通古斯诸族萨满教中显然是缺乏的。

^① [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74页。

^② [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63页。

Comparing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of shamanism between Tungusic and Korean

Su Ha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deals with the Tungus and Korean shamanism, compares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ituations, and describes the inclusiveness of Korean shamanis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ungus shamanism.

Keywords: Tungus; Korea, shamanism; history; religious identit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 第1辑 / 曲枫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2

ISBN 978-7-5201-5638-7

I. ①北… II. ①曲… III. ①北冰洋-区域-丛刊
IV. ①D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18984 号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主 编 / 曲 枫

副 主 编 /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Michael Knüppel)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邓 翊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别区域分社 (010) 59367078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28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5638-7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